

幼蒙、幼慧與幼學： 近世中國童年論述之轉折起伏

熊秉真*

摘要

倚仗生生而不息的社會人群，其生活技能、特殊知識，如何由長而幼，代代相傳，一向是人類社群存活、成長、擴張或消亡關鍵之一繫。過去學者析述人群間知識更替，技藝移轉之歷史時，嘗關注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的問題，以為漫長的思念傳承，大抵循直線而前進（linear progression）的基本預設。

以近世中國蒙學與幼教發展觀之，上層社會之重視蒙學，一般人群之企求神童早慧，早見於古史，惟若檢繹當時所遺文獻，即便有清一代，清初、中葉而清季，聞似「開明」、「進取」之幼蒙倡議，與執信奇慧、神蹟等福澤積善之追求，彼落此起，喧嘩多聲。在清代早期固可見相當自由、放任的幼教態度，與相當體恤、合情合理的幼蒙設計，進步之聲音、努力，直抵晚清，興而未艾；然而民間類書、坊間文肆，種種白描神啟幼慧的故事亦流行未艾。如此便形成了一幅理性進步與封建迷信並列、開明與落後雜存的矛盾情景。

故擇清初、盛清至晚清三組代表性素材，試析中國社會在此步向教育普及的漫漫修旅中所遭遇的疑難與掙扎。即清代童年文化與幼教傳承之演變，現中國近代啟動之前，傳統童年文化與幼教論述，本含一番省思與斟酌，而今重揭清代幼教演變之面紗，省視過去幼慧、幼蒙思維下醞生之幼教，舊貌與新思間別有一番契機。

關鍵詞：幼學、童年、童年論述、近世中國

*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投稿日期：97.5.5；接受刊登日期：97.7.8；最後修訂日期：97.9.17

**“Early Enlightenment, Child Prodigy and Early Education”
Discursive Chan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Childhood Thoughts**

Ping-chen Hsiung*

Abstract

This is a study of discursive changes regarding early education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368-1644). Positioned against the assumption of linear progression in history, or the enlightenment to modernity thesis in some historiographical narrativ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uncover and construct a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 culture that is at once multi-facet and complex.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ree sets of primary sources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hildhood culture in early-Ch'ing, mid-Ch'ing and late Ch'ing periods respectively. In which exercise, it is shown that some advocacy and teaching materials circulating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uld be quite liberal and liberating. 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out the late-Ming and entire Ch'ing period, conservative voices spreading a view about children's intelligence and childhood development as pre-determined by ancestral blessing and super-natural forces continued to circulate and remained popular. For the mid-Ch'ing or eighteenth century perio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of a more sympathetic and child-friendly attitude toward early education that was part of a elitist advice for a gentle and less-pushy approach to child education, popular beliefs in and ordinary people's pursuits for child prodigy was wide-spread and influential. As history moves on to the late-Ch'ing or nineteenth century, we see that reformist's ideas a less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Received May 5, 2008; accepted July 8, 2008; last revised September 17, 2008.

disciplinary, more understanding attitude toward early education continued to grow as they connect with early modern western convictions in childhood education rooted in enlightenment thesis. Furthermore, modern notions in pediatric physiology and child psychology began to make their way into Chinese newspaper and social thoughts. So much so that physical punishment, along with the harsher ways in children's treatment were see as outdated and reactionary.

To conclude, the paper argues that a chronological reviewing of childhood culture and early education during the early-, mid-, and late- Ch'ing periods reveals th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this area are by no means progressive in the linear fashion. Contrarily, the overall picture is one of ambivalence, contradiction, uncertainty as advocates, teachers, parents, and commoners moved back and forth among numerous progressive, liberal, or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even reactionary options.

Keywords: Early education, Childhood, Childhood discourse, Late imperial China

壹、前言

倚仗生生而不息的社會人群，其生活技能、特殊知識，如何由長而幼，代代相傳，一向是人類社群存活、成長、擴張或消亡關鍵之一繫。由此觀之，蒙學或幼教非因近代而起，更不是中國獨有。

過去學者析述人群間知識更替，技藝移轉之歷史時，嘗關注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的問題。以為漫長的思念傳承，技術變化過程中，重要時刻某地（區）某人（群）在一項概念、實踐上的關鍵性懷想、興革，往往有意或無心地將人群該項特定之瞭解操作帶上了一條迥然不同於前之新徑，而一次次如此一去不返的範疇性丕變，正是催生人群知識更新，造成技藝進步、乃至啟動社會與科技「革命」的根本緣由所在。¹

唯此一頗具啟發之灼見，經過科學史、思想史與經濟史數十年來之反覆推衍，巧思既明，局限亦露。最主要的，是當時隱涵於此思維論述下一股人類歷史大抵循直線而前進（linear progression）的基本預設，是既因視為當然而未嘗言宣，事後憬覺亦未必尋得任何修補或替代性模式。

即以下文所觸及的近世中國蒙學與幼教發展問題為例而言，中國上層社會之重視蒙學，一般人群之企求神童早慧，確可追溯遠古，早見於古史。因之若仿直線前進與典範移轉之歷史發展模式立論，極易訪得資料，建立起一套由幼慧、幼蒙與幼教的循序漸進之邏輯。近世二百多年來清代兒童教育之討論，依此理絡而釐出一番眉目，甚易完功，覽之似亦不妨。坊間所見蒙學資料之纂輯，²乃至歐西、中國教育史、幼學史之研究成果，多

¹ Thomas Kuhn（孔恩）對近世西方科學革命的結構性詮釋，是此由知識內涵及典範轉移之角度析述科技發展流派之最主要論著。參見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書中第八章The Response to Crisis、第十章Revolutions as Changes of World View中關於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之討論。

² 參見韓錫鐸主編，《中華蒙學集成》（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收錄之中國歷

半均為此模範思維下之產品。³

惟若檢繹當時所遺文獻，即便有清一代，清初、中葉而清季，聞似「開明」、「進取」之幼蒙倡議，與執信奇慧、神蹟等福澤積善之追求，彼落此起，喧嘩多聲。在清代早期固可見相當自由、放任的幼教態度，與相當體恤、合情合理的幼蒙設計，進步之聲音、努力，直抵晚清，興而未艾，似可視為一脈相承的進步理路，然而民間報書、坊間文肆，那種白描神啟幼慧的故事流行未艾，充斥街角。理性進步與封建迷信並列，開明與落後雜存，下面的尋思顯然有待「後典範」說明模式之一助。

援古往今來，求知或知識，或被視為一種工具理性上的必要活動，然亦有因宗教倫常中對自然、天機之嚮往；兩造之下，個人及群體遂不免對文明與教化持兩端之見，出現不斷反覆曖昧與低迴。就中國歷史文化長期發展之例而言，儒家對教化固持正面態度，但儒者中仍不乏對不識不知、一塵不染的天真陶然不能忘情。上古而中世道釋之倡絕俗遺世，益發強化了當時士庶間對求知向學與棄智灑脫兩難之間的拉扯。

此一對知識與學習既迎還拒的淵源，到宋明以後，因程朱、陸王兩極性發揮，以及商業經濟與文化市場的相互激揚，揭開了數世紀文明教化與

代訓蒙書，及張岱年為該書所作之〈序〉中之所述：「中國古代很重視兒童教育。《周易》蒙卦說：『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傳》云：『蒙以養正，聖功也』。……近幾年來，出版界注意到過去時代的蒙學書的歷史價值，翻印了若干種，引起人們的贊揚。」

³ 可參見拙著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年）；以及翁麗芳，《幼兒教育史》（臺北：心理出版社，1998年）。外國學界之研究則可參考：Philippe Arié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Shulamith Shahar, *Childhood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Linda A. Pollock, *Forgotten Children, Parent-child Relations from 1500 to 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返璞保元的曲折攻防。影響所及，無論城鄉士庶，老幼男女，常直接、間接面臨一波波「文明化」的挑逗挑戰，各為進取之選擇或遺世之淘汰。對教者、學者而言，要義無反顧追求制度性知識，或自安自得抱殘守缺以終，明清社會的個人與群體均不斷去界定其有益之知識與競逐之生活。而轉變中的各種幼學幼教模式，如何於幼齡學子步步走向文明化機制過程中幕幕展出，更是成了家長、教師殷盼取舍之考驗。欲論歷史變化中典範之移轉，探究清代幼學與童年論述所呈現之多重起伏與反覆轉折，自有其理論上之複雜（complicate）與修正原本預設之力度。⁴

故下文之作，一是構思上在擇清初、盛清至晚清三組代表性素材，試析中國社會在此步向教育普及的漫漫修旅中所遭遇的疑難與掙扎。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欲藉此例一試以習慣上思想史、制度史之文獻，側窺思社會史、文化史訊息之可能。而兩者之繫，均在將「知識」與「生活」之內涵與特徵視為一游移流動之現象，不斷隨特定歷史時空而轉變。陽明論天真良知，幼教普及後所面臨的教、學實踐上的諸般困境，益使推動蒙學的父師日常思維中，無時不透露對學步學語之牙兒邁入學堂之際所揮之不去的惶恐與質疑。當父兄催促田野孩娃暫擱其原有寬廣的生活之知，而肅容端坐、企首引頸，力求狹義難得的扉頁之知，乃至特定技藝上的有用之識、入仕陞遷的科舉之學。其孜孜之追求，一如其日常之挫折、四圍之陷阱，無不閃現著前近代與近現代交替之際，對孰謂知識、如何生活的無盡的搏

⁴ 對於程朱性理一派與陸王心性一派對蒙學觀念的差異，則表現在朱紫陽和王陽明之蒙學著作論述中。略而言之，朱子《小學集解》、《童蒙需知》兩著承襲性理之說，希冀透過蒙學教育開始的種種規範和教育灌輸，「去人慾，存天理」，以至「入于大賢君子之域」。而王守仁之《訓蒙大義》則較強調誘導之道，一反前述制約之理，企圖透過「誘之詩歌」、「導之習禮」和「諷之讀書」，以漸進、順導或默化的方式達到儒家教育的目的。究其兩者差異，朱子之法欲制約幼兒的嗜慾以達教育的理想，而陽明則以幼兒之本性本心作一起點，擬定適合的引導教育之法，進而引申出明末李卓吾〈童心說〉所主張之幼兒的「童心」即「心之初」、「最初一念」的「本心」，並回歸、讚頌一切純真與本初之人性。參見熊秉真，《童年憶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191-216。

鬥與未了的困惑。

由此角度考量，清代的幼教發展與童年文化，深值細究，另有幾層緣故：一是由於辛亥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遺產，以及二十世紀「現代化」的洶湧波濤，形成對「傳統」與「過去」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這些看法中，意見與主張居多，實際了解上之成份不大。⁵以致認為近代革命新天地降臨，改造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時，所遭遇的是在一個頑固僵化、封建腐朽、不合世理人情，而又一成不變的舊有文化體系。並印象式地主張步向現代性進步或革命性解放之前，男女老幼、貴賤貧富、地南天北均在高壓桎梏的悲慘世界中，苟延殘喘。這個既模糊、籠統，卻又揮之不去的夢魘般的印象，置之於歷史微觀座標上試以史料史事為之定位，切需清代幼學幼教多種相關素材之填充、佐證。

再者長久以來，在革命情操，文化推陳出新，與整體現代化浪潮鼓舞下，大家習以為常的歷史（包括歷史資料、歷史研究、和歷史詮釋等），莫不認為是由僵化遲窒的過去，接觸現代化之推動後，個人與群體自動或不自主地，或早或晚都邁入了一個義無反顧的單線進程。在此頑固不通的「過去」，直線單向進入合理而進步的「現在」史觀照耀下，清代而民國，數世紀間中國境內各民族、各階層、各性別，乃至不同年齡的民眾生活，不論個別或群體經驗，因早有通盤說法，後世學者只在稍費手腳，略假思索，卒得掌握合適的來龍與去脈，即可套上命定式的歷史萬用公式。

三者，此一整個套裝預設，對人類社會之假想，大家均清楚是模擬歷

⁵ 最近中國近世與近代的史學作品中已漸有注意到此現代政治立場與文化心態對中國歷史的渲染與曲解。Dorothy Ko, *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一書前言中對五四論述之左右傳統中國性別形象，頗多析述。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則意在釐清並矯正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意識下所造成的「泛政治化」了以後的歷史面貌。

史先行者、歐美之文明化進程為度量衡，直以西方或近現代思想文化與生活方式，為舉世人類「進步」之同義詞。彼般現代文明與進步的化身，既如「永恆之定律」，任何社會人群不過在卯足全勁，馳達終點，遂亦無須行進，不復有變化必要或可能。人類在「現代化」與「現代性」之後，遂無下一站的歷史變幻可想可言。而群策群力步向現代的蹣跚之旅，只有將「過去」與「現今」錯綜複雜的群體生態與百味俱備的日常生活，均制式地化約為單一的善惡、良窳之取捨對象。如此歷史圖像中，不但豐盈的平日「庶民經驗」變成陌生而不可解，連帶地近現代社會制度與文化生命力中所呈現的多面多樣活力，以及不斷亟須的迴思與反省，似乎也在專斷信仰的殃及之下，邈無立足空間。

本文之作，即欲藉清代社會與人文生活中之一環節，即清代童年文化與幼教傳承之演變，針對上述政治意識型態傳統，與人文科學之假設，作一對談，試以兒童文化與幼教論述之推衍細節，呈現中國近代啟動之前，變幻多端、生機四綻、而又爭辯激揚的所謂傳統時期，曾以如何之力道，運轉其重要文化支柱，以之迴映西方現代演進式思緒之特性與局限之所在。一則展示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化與幼教演變，原有一未曾細察，或曾被遺忘、掩埋了的過去。再則亦藉此視角，與其他扞格主流之角落人群，重思群體意識與時代慣性，常築於許多日常流傳的不言而喻而實際上又相當專橫的預設。中國傳統幼幼之道的傳承歷史，不但於清末民初曾理所當然地孕生了近代中國的兒童文化與幼教世界，如今重新檢視，仍隨時因知識視野關懷轉變而展示其新解意涵，啟動另類之凝想、併發他種臆想之玄機。傳統童年文化與幼教論述，本含一番省思與斟酌，既因近代革命與五四新文化之典範漸遠，其政治文化與社會心理上特定之基礎與需求早已位移，如今重揭清代幼教演變之面紗，省視過去幼慧、幼蒙思維下醞生之幼教，舊貌與新思間別有一番契機。

貳、近世的兒童文化與幼教論述

中國幼齡人口之經驗，近世流變是一大歷史轉折。⁶此轉折在晚明至清季之浮現，上與明代中葉以來版刻活躍後對兒童知性天地的衝擊，以及明清兩代幼蒙市場的擴張，均不可分。過程中，教者、學者、送館家長、社會人士對幼教方式與內容的種種困惑與議論，未必如後代之激烈，卻隨處可見。兩方面力量的匯集，加上前述程朱、陸王兩支不同人性論之持續發酵，以及儒、道、釋雜揉，士庶合流，南北城鄉來往所造成對兒童與撫幼之看法漸移，使得清代各樣幼教論著，與諸般蒙學素材，內容中不免五味雜陳，新舊俱見。對幼兒的先天稟賦，人生知性感性之各種理解，乃至幼齡初學階段可以如何、理當何是，於市井所談可能頭頭是道，在筆端論著似亦引典據經，但實際上恰恰在少知少覺中不斷左右張望、在一是莫衷間探索匍伏。

追究兒童史者，若受西歐社會在歷史過程中兒童與童年呈現古今變異的慣習解釋之影響，不足對社會文化史中年齡與人生週期等變因有所體認，亦不能不意識兒童、幼教均為特殊時空下之產物，與人文社會上之任何其他現象、事物，並無二致。雖然目前所見兒童與幼教史論著，仍多以西方為中心、以現代為權威、以科學為標準、以進步為信仰，但對此類課題之少數回顧與前瞻，不論著眼歐美經驗、或者聚焦於其他社群之歷史發展，其認識與思考若落實於具體細節，往往不免牽扯出廣義的人文社會思潮，及狹義的兒童、教育問題，在不同的價值假設、目標認定與社會經濟條件下相互作用。⁷西半球現代幼教啟動前夕，義務教育普及之際，推動

⁶ 對於中國童年在上古至近世之歷史分期，筆者於他處另有闡述，請參閱熊秉真，《童年憶往》，頁271-326；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15.

⁷ 關於西方幼教之歷史演變，論著極多。1993年冬季的*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曾有一波的回顧與討論，可特別參閱如下四文：Martha

社會改革者對社會秩序的關懷，常高過對兒童自身福祉之憂慮。十九世紀提倡英法幼兒教育者多半是為了協助警局維持治安。1820至1840年代紛紛仿效的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因之對幼教目標（是為了啟迪民智還是灌輸宗教倫常）、幼教方法（究竟應該用力於字母學習還是道德行為）、乃至教材與內容都在激辯，而始終未得任何一致之結論。⁸

回檢中國視角，歷史上中國的兒童是否生活於一個高壓權威、不合情理的傳統社會裡？目前或未來是否已擁有、將邁向一個進步文明的美麗新世界？面對此類初聽似極自然，但有關訊息零星，尤其提問動機十分曖昧，追究之終極目的莫衷一是、茫不可解的課題，挖掘歷史、向時光流變前的人世沉潛學習的歷史工作者，在追蹤綿長的過去與流動的現在之間的關係時，必須小心翼翼地撥去塵封，仔細掀開兒童、童年、蒙養與幼教的層層扉頁，其於梳理點滴往事之中，覺悟到的將不只是人世曾經之錯雜繁複，更將不能不訝然於時間翻轉、後來居上之後，所有現今的觀察分析與發言立論者，皆自縛於必然之偏執與難免之驕矜。⁹

本文之所以擇清代蒙養文化與幼教論述中的一些主要議題，說明其立場、面貌、內容上之多樣多變，並由清初、盛清、清季三大時段出發，略示二百多年來兒童與幼教問題在中國社會中的演變大勢，正在於藉著重訪過去波波攸關學習之改革、嚐試與轉折，以其思維步履，折照二十世紀初

Minow and Richard Weissbourd, "Social Movement for Children," *Daedalus* 122 (1993): 1-29;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Contexts of Optimal Growth in Childhood," *Daedalus* 122 (1993): 31-56; Maris A. Vinovski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n and Now," *Daedalus* 122 (1993): 151-176; David K. Cohen and S. G. Grant, "American's Children and Their Elementary Schools," *Daedalus* 122 (1993): 177-208.

⁸ Colin Heywood, *Child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 Health, and Education among the 'Classes Popula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2-213.

⁹ 對於近世西方和中國幼童教育思想之演變與比較，筆者於拙著《童年憶往》第五章第四節「中西幼教觀與童心論」有較細闡述，請參閱熊秉真，〈《童年憶往》〉，頁216-229；另見 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32-37.

以來中國民眾生活與幼教制度之接軌，證明舊式幼教傳統既未必抽象空洞，也不全然僵滯固執，不過是立足於另一段對人生之「知」與「能」的領會與期許。竊期此一歷史文化上的迴游，能助吾等擺脫部分衍生於近代追求進步演化之實證面自信，與知性上的我執，對所由來徑，得掙脫若干慣性又盲目之抨擊與鄙視，置此一時與彼一時之掙扎，於相類的歷史平台，同時去摸索於今於後，未必勝券在握、棋高一籌的兒童處境與幼蒙問題。看看減少幾分固定的自以為是、貶史以自高之後，是否足以對全球「現代性」籠罩下的求知識、謀生活之既定企劃，能增幾分必要的疑惑，與掬去成見以後久違了的清新。

參、善誘與傳家：不達更欲速

一、父師善誘

浙江澉水土紳唐彪（字翼修，確切生卒年不詳），生於明末，活動於康熙年間。曾摘宋元以來蒙學議論，輔以個人訪查經驗，匯成一部幼學綱領，名為《父師善誘法》。¹⁰此書分上下兩卷，以三十子題說明蒙學教育所涉切要問題。¹¹原書之範例稱「集古人成語與自己所著」刪次而成（自謂

¹⁰ 清·唐彪的《父師善誘法》輯成後，曾刊刻多版，或以原名家刻本重刊，或與其另著之《讀書作文譜》合刻而成《家塾教學法》（最早刊於康熙年間，前有毛奇齡康熙三十八年〔1699〕之序）。此書近代續有刊刷，最近者如一九九二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所出的趙伯英、萬恆德選注本，參見清·唐彪輯注，趙伯英、萬恆德選注，《家塾教學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¹¹ 上卷的十三個子題是：「父兄教子弟之法」、「尊師擇師之法」、「學問成就全賴師傅」、「明師指點之益」、「經蒙宜分館」、「師不宜輕換」、「學生少則訓誨周詳」、「教法要務」、「讀書分少長又當分月日多寡法」、「父師當為子弟擇友」、「損友宜遠」、「勸學」、「字畫毫厘之辨」；下卷十七個子題是：「童子初入學」、「童子最重認字併認字法」、「教授童子書法」、「童子讀書溫書法」、「讀書訛別改正有法」、「童子讀註法」、「覓書宜請教高明」、「背書宜用心細聽」、「童子學字法」、「童子宜歌詩習禮」、「童子講書復書法」、「童子讀古文法」、「童子讀文課文法」、「改文有法」、「童子宜學切音」、「教學雜條」（附「不習舉業子弟工夫」、「村落教童蒙法」）。

將「二十五萬餘言」之原稿刪汰而「僅存九萬餘言」)，構思之際並曾「數數請問」兩浙名儒「如毛西河、黃黎洲、吳志伊諸先生」，均蒙「不吝指示」。¹²書前有自署家眷弟的仇兆鰲和毛奇齡兩序（分署康熙三十七、三十八，即1698、1699年），稱唐氏乃「金華名宿」，清初回歸後，於「東西兩浙人文薈萃之所」，「出為師志若干年」。「理徒講學」之餘，輯成「學規二書」。可見書之孕生，與作者個人教塾鄉里的經驗，當時地方士人對蒙學的看法，以及朝廷部議頒行的朱子《小學》，都有密切關係。是時內地童子「無分貴賤少長」，亟以就傅入塾競相成士最為急務。¹³唐氏書中自稱：「父兄教子弟，非僅六、七歲時延塾師訓誨，便謂可以謝己責也。」必自「幼穉時」，即「多方陶淑」、「教以幼儀」，期其日後「學必有成」。¹⁴《父師善誘法》一出，異軍突起，立刻為清初幼教風貌樹一特出範本。

書中不但對父兄擇師尊師、¹⁵覓書擇友等啟蒙的基本態度，¹⁶童子初入學時識字、學字、讀書、溫書、講書、復書，¹⁷訛別改正、學音讀文等具體幼學活動內容，¹⁸說明詳細。最重要的是全書對幼學旨意，主張以「善誘」為「教學」之本，二義互通為一。唐氏初以《父師善誘法》名其書，合刻重印後則常稱為《家塾教學法》（毛序中稱《家塾教學法》乃其舊名）。

¹² 清·唐彪輯注，趙伯英、萬恆德選注，〈前言〉，《家塾教學法》，頁3。

¹³ 參清·唐彪輯注，趙伯英、萬恆德選注，〈仇兆鰲序〉、〈毛奇齡序〉，《家塾教學法》，頁1。

¹⁴ 清·唐彪，〈父兄教子弟之法〉，《父師善誘法》，上卷，輯於《家塾教學法》，頁3。

¹⁵ 清·唐彪，〈尊師擇師之法〉，頁4-5；清·唐彪，〈學問成就全賴師傳〉，頁6；清·唐彪，〈師不宜輕換〉，頁9。

¹⁶ 清·唐彪，〈父師當子弟擇友〉，頁13；清·唐彪，〈損友宜遠〉，頁14；清·唐彪，〈覓書宜請教高明〉，下卷，頁25。

¹⁷ 清·唐彪，〈童子最重認字併認字法〉，頁17-18；清·唐彪，〈教授童子書法〉，頁19-20；清·唐彪，〈童子讀書溫書法〉，頁20-22；清·唐彪，〈童子學字法〉，頁26；清·唐彪，〈童子講書復書法〉，頁28-29。

¹⁸ 清·唐彪，〈讀書訛別改正有法〉，頁22；清·唐彪，〈童子讀古文法〉，頁29-30；清·唐彪，〈童子讀文課之法〉，頁30-32；清·唐彪，〈童子宜學切音〉，頁35。

¹⁹細索內容，全書對幼兒進學之階，考慮仔細，態度剴切，尤其下卷第十小節，以「童子宜歌詩習禮」為題，抄錄王陽明〈訓蒙大意〉一段全文，一再重申陽明對「教童蒙」者，重童子「樂嬉游而憚拘檢」之情，強調接近童子時，「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譬之時雨春風，沾被草木……自然日長月化」。²⁰故上卷第一篇〈父兄教子弟之法〉即有「導之以色聲並誘其嬉遊博弈」之言，流露出清初用心幼教者，外程朱而內陽明（仇兆鰲序中曾美言唐著，當與部頒朱子《小學》並行），特重「循循而善誘」之旨。書中各節，對蒙學每一步驟，均指明適用蒙童之年齡，使用之場合，易有之訛誤差池。頻期依「經蒙分館」、「讀書分少長，又當分月日多寡」等原則，循序漸進，適時適性，²¹亟欲試施於清初活躍而快速成長中之幼教大環境。為矯時俗，唐氏高揭自然緩進，切誠執意勉強。其議論以個人所行所知立說，透露出務實之蒙幼作者，以「實證資料」，對質前賢理論、朝廷政策、與社會時俗之立場。²²

¹⁹ 清·唐彪，〈毛奇齡序〉，《家塾教學法》，頁1。

²⁰ 清·唐彪，〈童子宜歌詩習禮〉，下卷，頁27；王陽明，〈訓蒙大意〉，《陽明傳習錄》（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219-221。

²¹ 清·唐彪，〈經蒙宜分館〉，上卷，頁7-8；清·唐彪，〈讀書分少長又當分月日多寡法〉，頁12；清·唐彪，〈看書須分界限、段落、節次〉，《讀書作文譜》，卷十，輯於《家塾教學法》，頁65-66；清·唐彪，〈看書分層次法〉，頁66。其中，〈看書須分界限、段落、節次〉、〈看書分層次法〉等二節對學習循序漸進，學子心智進層之有階有次，亦有類似體認。

²² 《父師善誘法》中多篇內容均舉唐氏個人經歷，以所知、所聞、所見、所訪之學童實際學習舉止，日常狀況，為構思立論之根據。下卷〈童子讀註法〉中，自言：「余每閒遊諸鄉塾，塾師每言資鈍者苦於讀註。余意於經書讀畢之後，將注另自讀之」。相對更「有一友極非余言」，端衡之間，至「余不能決」，並不斷舉觀察所見，反覆推敲。〈童子讀文課文法〉中亦先標出問題爭議所在，隨舉之「余至親二人，一學文五年，一學文六年，而文理皆不能明通」之實例，與「何以余少時學文僅一年而即條達」相對，推敲之間，對左右「師與徒皆大笑，以余為妄」，亦不以為意，堅持所主「此非余一人之臆見也」，而「凡事試驗者方真」。見清·唐彪，〈童子讀註法〉，《父師善誘法》，下卷，頁23；清·唐彪，〈童子讀文課文法〉，頁30。

教與學相提而並論，上承《禮記》〈學記〉篇「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等教學相長的一脈之理。然二千年後唐彪重拈「父師善誘」為「家塾教學」之旨，更表達了他對清代家庭與學校環境中，實踐幼教之重要性，即於幼兒心智發展，不但不仗天生聰慧、神童稟賦、性靈天啟，而且執意無論教學，其善偽也，一切都在父兄家塾之用心經營，有意謀劃、費力栽培，在古典基礎上重賦近世體會。蓋時至十七世紀末，不但作者於價值觀上，關懷所及已不再只是上層縉紳子弟之進學中舉，實際上散落各地的社學、義塾中還包括鄉間「不習舉業子弟」，及「村落教蒙童」等新增成員。²³唐氏全書旨旨非謂深奧，意亦不在提出高妙教育理論。然藉強調善誘漸進之「教」與「學」，另方面亦間接透露出近世由明而清，市鎮富鄉中工農庶民子弟大量湧進塾學之趨勢，以及都會城坊中士商家庭力督子女儘早向學的走向。探討此蒙學新市場衝擊之下，在供應面，對塾師及幼教方法上所造成的因應與調整。此幼蒙需求面之擴大，加上科考落榜者在供給面所提供的豐沛師資，使得十六、十七世紀以後，中國由南而北，塾學中面臨了齒齡日稚，數日益增的待蒙幼童。此一幼學人口與幼教市場之新型態，固為不少就館謀食卻未必有心長為師塾者增添不少煩惱。另一方面，對究心蒙幼問題者，明代陽明學所倡良知良能說，此時此景下突如天助，適而提醒也提供大家一個以短為長的幼教另類蹊徑。即從譽揚人性自然天真之理，重視個人分殊之性，看是否能掙脫刻板規律之教條化設計。此一理路，上舉《父師善誘法》中行間字裡固所多見，唐氏著作外，亦散見明季清初其他論教育與塾學、書院論著之間。此論述系譜下，生活與知識不再如宋儒預設對執之二端，蓋或教或學均不必單作日常生活庸謹之約束或終結一解，亦不再以有組織系統之學堂教育為知識學習獨一無二之開端。蒙學對象年齡稚幼，依陽明之說正去天機不遠，若以善誘善導，勿折其性嗜癖好，或意得撥負為正，反為欣然求知問學之天賜樞紐。²⁴是故唐氏全

²³ 清·唐彪，〈不習舉業子弟工夫〉，頁37-38；清·唐彪，〈村落教童蒙法〉，頁38-39。

²⁴ 參見熊秉真，〈童年憶往〉，頁198-216。

書中，段段充滿對塾師父兄之警誡，謂「六歲且勿令終日在館，以苦其心志而困其精神」、²⁵「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書」。²⁶要為師者「教讀書，不可過五、六遍，至多不過十餘遍止矣」。²⁷所有這些切切萬勿之告誡，固可能代表成千學堂實景，更點出陽明學為近世教育和社會心理所蘊深刻自省自疑契機，及與其制式人生、制式教育相抗相擷的萬鈞雷霆。就理念和價值觀而言，程朱陸王人性之爭無時或息，生活是否即為知識、良知是否啟於良能，更是古今東西迄今未決之大惑。如是重觀清代為幼蒙請命者如唐彪之力竭聲嘶，其所始者，或者不過是一己幼兒入學時之挫折困頓，²⁸然所牽出評量思慮卻不限一兒一戶，甚至清初任何一地一時之辯解或疑惑。鼓動興趣、導之向學為旨趣的幼教典範，使此書之刊布流傳持續不斷。二百多年後近代教育專家陶行知再次提出「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以「教學」為「教授」之真意，²⁹中國幼教自唐彪之後，精意直貫現代，後得新生，古今之脈，代代新機，遂非由對立中擇一之慣性史學能盡。

²⁵ 清·唐彪，〈童子初入學〉，頁17。

²⁶ 清·唐彪，〈童子最重認字併認字法〉，頁17。

²⁷ 清·唐彪，〈童子最重認字併認字法〉，頁18。

²⁸ 唐彪曰：「余子正心，自六歲入學，因書不成誦，三歲歷三師，至四年無可如何，不復易矣。其歲，則甲寅也。因兵亂，避居山中，適有朱兩生設帳其地，因令就學。從游至五月，所讀新書，不減於前三載，且於前三載不成誦之書，無不極熟。彪敬問其故，答曰：『吾無他術，惟令認字清切而已。令郎非鈍資，止因一二句中，字認不清，不敢放心讀去，則此一二句便不熟；因一二句不熟，通體皆不成誦矣。又嘗試驗之，童蒙苟非先生強令之認字，必不肯認；認過而仍忘者，苟非強令之來問，必不肯問。此皆先生所當知者也。』彪思：讀書在認字，甚為淺近，何以前三師皆見不及此？乃知甚明之理，未經人指出，未易知也。」參見清·唐彪，〈童子最重認字併認字法〉，頁18。

²⁹ 清·唐彪輯注，趙伯英、萬恆德選注，〈前言〉，《家塾教學法》，頁3。

二、傳家之寶

入清一代，類似《父師善誘法》談論家塾教學的訓世書刊固然不少。然而明季而盛清，幼教塾學多方成長，學童不僅人數增加、年齡下降，且繼續散播普及社會一些新的階層，地域上也由市鎮而及鄉里。加上科考失意淪為塾師者多，師資供應無虞。教師中遂不乏以實地經驗補過去理論之不足，從而調整衍生出重重新義，此為是時蒙學幼訓著作大量問世的大背景。著作雖未全直接以幼學專論面貌付梓，而側身一般訓俗雜言之中。日用類書形式下產生的《傳家寶》，康熙年間刻行，清至民國刊刷多版，流傳民間極廣，影響更大，尤為一項值重視的藏幼教於訓俗之樣品。

《傳家寶》的作者石成金，乃清初揚州一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儒。在四集數十卷、百多篇的內容中，涉及幼教部分散見初集各卷，以十多種不同專題形式出現。³⁰與當時其他論幼學之著述相比，此書因類書雜纂之背景，顯得強調家庭教育、家長態度與學校教育、塾學師長之配合，偏重子女日常行為規範之訓練。此一特色與《傳家寶》作為一般家庭日常參閱之百科全書，固不無關係，與作者視世風社教與幼學訓子為一物之兩面，家教與塾課不可偏廢的原則亦正相符。清代課兒教塾先生對社會環境因素的體認，以及對兒童行為訓練上的重視，於此例上遂成了一個一分為二的知識市場現象，亦可視為二而為一的文化生態問題。

《傳家寶》初集卷之一的俚言中，有題為「教子」一節。全篇主旨在

³⁰《傳家寶》刊行後，常見的有康熙刻本、乾隆刻本，及道光十四年掃葉山房刻本，還有四集二十卷及四集三十二卷二種形式，近年金青輝、閻明遜曾出一點校本《傳家寶》（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1992年），分上、下兩冊，共四集二十卷。其中卷之一的「傳家寶第一」、「傳家寶第二」、「學堂條約第三」、「讀書心法第四」、「師範第五」、「課兒八法第六」、「學訓第七」，卷之六的「神童詩第二十九」、「正學歌第三十」、「天福編女訓第三十一」、「童禮知要第三十二」、「常禮須知第三十三」，都是與童蒙與幼教直接相關的篇章，參見清·石成金，《傳家寶》（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1739〕序重刊本）。

告誡家長須加意善教子孫，論理上先承認「世上接續宗祀、保守家業，揚名顯親，光前耀後，全靠在子孫身上。子孫賢則家道昌盛，子孫不賢則家道消敗」。因此，「無論貧富貴賤，為父祖的，俱該把子孫加意愛惜」。而「所謂愛惜之道，『教』之一字，時刻也是少他不得」。³¹然後藉說明嬌溺子孫之不是，拈出教子之重要。有謂：

可惜而今有子孫者……嬌生慣養，使性氣也不惱他，罵爹娘也不禁他，欺兄壓長也不約束他，慢鄉鄰辱親友，游手好閒，任意為非也不責治他。一切飲食衣服從其所好，滿口膏粱，渾身綾羅。甚至誣賴騙詐，好爭慣訟，壞盡心腸，除不警戒他，更有反誇子孫乖巧者。³²

石氏所指恃寵而驕的子弟，除了部分江南與華北高官富戶外，未必真是社會實情。但他數落世上「老年得子的」，「生子艱少的」，「俱愛之如掌上明珠，恨不得時時捧在手裡，日日含在口裡，止知道驕養放縱，全不知道教訓、責成是為子孫的好事」。還有「逞強的人」、「護短的人」、「糊塗的人」，種種偏頗，縱容子孫矯飾非為，吝於干涉，³³一發難以收拾，卻是清代中葉內地人口滋生大勢，遭逢登科仕道所提供的上行社會流動（up-ward social mobility）之刺激，以及商品市場經濟之活絡鼓舞，在城鄉街道，各階各層之間，因社會結構性鬆動（sociological change），加上經濟誘因之（economic incentive）明顯化，兩項匯合之下在一般民眾之心理上所造成的一種充滿期待下的焦慮，或者市井心態下因對成長、牟利、上進時機之興奮，反而投射身上的某種恨鐵不成鋼的怨艾。

《傳家寶》的作者痛砭時非之餘，強調「教子」的重要性，以及「教子之法，全在幼小時候」（「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以及「教子之法，也

³¹ 清·石成金，〈傳家寶第一·教子〉，《傳家寶》，卷之一，頁29。

³² 清·石成金，〈傳家寶第一·教子〉，頁31。

³³ 清·石成金，〈傳家寶第一·教子〉，頁34。

要循個次序」的道理（「六、七歲時，便送學讀書」，「到十三、四歲，更要擇賢師良友，……教他讀書上進……，便教他習學技藝」，³⁴一再倡言教子務「嚴」，不可寬縱，但又表明，嚴不等於罰，³⁵均可視為此興奮期待中，家長、教師亟欲進取，訓俗作者亦搶著進言，以為奧援的蒙學大躍進下的部分社會圖像。

卷二「課兒八法」一篇中，說「少授」（「如念書能念十行，只與之七、八行念。一則力省易熟，二則養其精神，講解字義」）。並特別標出「活機」一義，要求課兒教子者留心：³⁶

夏秋晝永，正務易完，不妨令其隨師閒步。或問其平日所習字義，當日所講書理，或見草木鳥獸，俱與誌名識義，或古今帝王師相，歷代賢儒名佐，俱就便敘論。久之開益神智，積累自富，正不獨散其困倦已也。³⁷

夏秋晝長之時，為了驅散孩童的困倦，攜之野地閒步，進行「戶外教學」，頗帶陽明先生遺意，亦可見此書主張嚴教之外，濟之以寬，欲試倡啟發誘導並重之微意。也就是說傳統幼蒙堅持「記誦」的習慣，經明代三教合一後大家對忘懷與天真的正面表彰，於此匯見於陽明學上對「悟性」的一脈承衍。

書之卷六處，列有「正學歌」一篇，以七言律詩十首，誦習「誦書」、「坐位」、「行走」、「言語」、「飲食」、「孝親」、「敬長」、「待人」、「安份」、「戒非」等義。³⁸其內容精神則又與程朱小學，及朱熹「童蒙須知」所立

³⁴ 清·石成金，〈傳家寶第一·教子〉，頁35-36。

³⁵ 清·石成金，〈傳家寶第一·教子〉，頁37。

³⁶ 清·石成金，〈課兒八法第六·少授〉，卷之二，頁58。

³⁷ 清·石成金，〈課兒八法第六·活機〉，頁60。

³⁸ 據石氏〈正學歌自敘〉，其作「正學歌」之原本於：「予幼從蒙師啟讀，每晚授以放學文，歌詠而散，其歌俚亂不切。及長而見九嶷李先生童訓十二章……一日於廢紙中偶獲蒙訓七律，作者姓氏逸而弗傳，予又另取樂吾韓先生詩五律合成十首，謬名曰『正

拘謹之幼教行為規矩，甚為接近。

如前所述《傳家寶》之類的清代幼教文獻，透露出的歷史情境訊息豐富而駁雜。從社會史的意義上看，早教、嚴教，循序以進，乃至束其行為等幼教幼儀要義，早存中國本土士人階層之間，並非新義。只在教學內容與言語趣味，有趨豐饒生動傳神之勢。儒者無時或休的化民成俗、推廣教化的責任感，在明清以來，因社會流動加劇，商業繁興，士庶雜處，城鄉交流，是否適藉像石成金所倡教塾經驗，化禮教為俚俗的聲音，同時反映迎合了供需雙方心理，而益得商業文化市場的發揮空間。

就文化史上看來，平民化與俚俗化以後的幼教宣導，寬嚴並濟而雜採，程朱之禮教與陽明之自然，因並存而得折衷兼取，教女與教子，舉業與習藝，頌經與認字，城鄉士商，士庶各階均躬身自照，各依所處所需，拼湊擇取，自適其適，並舉不廢，一則呈現當時價值倫常上日趨寬容與多樣，二則實務面亦順勢配合上了社會需求面之擴大與成長（女孩與男孩，城鄉士庶、貧富貴賤，大小年齡的孩童都在走入塾學的過程之中，逐漸全成了教育的對象）。受激發後重新調整的多管道幼教，考慮形形色色動機不同的家長、良莠不齊功能各異的教師、多立場幼學需要（各類子弟，各種生計發展），在這價值鬆動與市場需要所造成的雅俗並進，各取所求的社會態勢中，兼牽扯出文化生態上漸趨多元多樣的走勢，《傳家寶》提供的恰是此喧嘩眾聲之際與俗見中綜合新的小結的實例之一。

在這個盛清幼教洪流和訓俗雜選的文化剎那，事後可以觀察到的放大切片或歷史特徵，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上泛義性知識有走向狹義的專業性、制度性知識的衝動與可能，雖則同一時空中原來天機自然，爛漫隨意的認識、瞭解和生活技能，仍然四處可見、比比皆是，固然在蒙學普及與蒙生

學歌』」。敘中所稱實不可考，但可見清世各種童訓詩之著作流傳，頗多且廣。參見清·石成金，〈正學歌自敘〉，《傳家寶》，卷之六，頁28。又近年出版之點校本將此段文字句讀為：「予幼從蒙師啟讀，每晚授以放學文歌，詠而散其歌，俚亂不切」，似誤。見清·石成金撰集，金青輝、閻明遜點校，《傳家寶》，頁265。

幼齡化時，遭遇到僵化刻板的塾師塾課的困頓，卻適可借晚明方興而未艾的陽明良知良能說，枯木還春、躍然再興。另一方面，此一漫長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留下的一支伏筆，其後遭逢近代學校教育與幼教發展的另一波浪潮之鼓動，進退迎拒間，又成了中國啟蒙教化與革新幼教者隨時可汲的本土源泉、隨處可用的反手之拍。其中關鍵無他，只緣盛清時所嚮往的未來、所追求的教育與幼教上之光明壯闊遠景，迨至歷史洪流轉及清季民初，一時間全化為替「全盤西化」助勢之形色。此時東亞或中國之時序綿延已不僅於所謂清季民國一域一國之考量，二十世紀初「近代性」(modernity)在西半球之變化詭譎，雖未定鼎，然而單就幼教與教育之發展而言，十九世紀下半葉與二十世紀初制式學堂內一體同仁式的科班教育，短時間內既可滿足了驅貧兒亂童入學堂而端坐木立，敬謹受教以為富國強種之新(國)民之義。暫時也就顧不得、想不到後來歷史時光拉長下，都市中拘謹的課室，制式教與學所顯得的匱乏貧瘠。也就是說，早在一八七〇年代起，義大利鄉村與瑞士學院中，追求純樸鄉里的蒙特梭利(Montessori School)與放縱天地、企近自然的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式的小小實驗，如何緊緊扣住了日新又新、翻前波啟蒙而起的另一波質疑與反思，必須待現代後期歷史態勢之降臨，方得躍昇雀起。而這下一波的鬆動與商榷，在下波歐風美雨，尚未御駕東來之際，其企圖、動機、氣質上，與陸王對程朱之擷抗，乃至基本人性與教養上的良窳所恃及張弛互用，在沒有全球教化聲息大通的情況下，少了古之遠東與今之歐西之相互奧援，過去史跡文獻在當時當地的面貌與真義，也就基調難定，少了後代時空不斷重訂的歷史意義座標之反射，近世明清幼教蒙學內情之詮釋，隨亦顯得游移而漂泊。

肆、「教兒童，莫匆匆」？——幼慧與蒙養

童蒙幼教應如何開始適時、進度合宜，宋元明清以來部部幼學書刊，每位關心蒙養者念念不忘。陸游詩中嚮往農閑時課兒自適，謂：「教兒童，

莫匆匆」，³⁹點醒了蒙教的兩重面象，叮嚀家長塾師於幼慧啟蒙不必固執心急，要父師注意勿因自身之急功近利，逼趕學童之成長進度。開明的態度，自由放任的聲音，與坊間幼蒙教材並列，及各方源源不絕對神童早慧的信仰、祈求相映，亦顯出近世士庶各層對兒童與童年，各異其趣的看法，及社會勢力間的拉拒。明清幼學幼教蓬勃發展時大談其道的書籍，談識字、授書、誦背、作文，有一再告誡父師大人，勿急疾、勉強，以免成效不彰，倒收反效的聲音。然而市井均知，宋元而明清，家長、塾師乃其督導下的子弟急求進科取士。即便退而活躍市場，技藝工商、生殖農產，百行百業各有利潤吸引，競爭刺激，老幼男女，少有不趨進若鶩者。啟蒙年齡愈來愈小，一如蒙書充斥，教法日密日嚴，塾師紛紛束手，不過是此競相爭先的社會潮流中的一二面相。⁴⁰大勢之下，教塾授課者固不能不營營汲汲，父母家長常恨不得子弟日進千里，趁早出人頭地。環境風氣如此，任何逆勢欲挽狂瀾者，只能在稀世警俗與推波助瀾雙向奔流下操其迎拒。

一、《年華錄》與《人壽金鑑》

清代中葉乾隆後期，出現了一部《年華錄》異書，其內容及刊編過程，頗可反映此時波瀾中承襲流俗的一面。此書初問世時，署名全祖望著，讀者褒貶不一。⁴¹及至乾嘉之際，江蘇學者程得齡（約1780年生）見書，不但「決為蹇淺者偽託」，⁴²且斥「擇焉不精，語焉不詳」；⁴³然又以內容體例

³⁹ 宋代文人雅士頗有以歸隱教兒為浪漫雅趣者，故常有山中鄉間課兒之即景詩作。號放翁的陸游所留下的一些詩句，是其中的部分代表。此處所引乃陸游晚年八十歲所作〈農事稍閒有作〉中的詩句，曰：「孝經論語教兒童；教兒童，莫匆匆」云。他在〈山行贈野叟〉詩中亦有：「幼學及時兒識字」之句。參見陸游，《劍南詩稿》，卷57-12、卷56-20，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頁390-219、390-211。

⁴⁰ 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中國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一文中，對近世由或競爭式幼教之愈演愈烈，守之而明清，啟蒙年齡日降，早慧與自課之強調日深，有若干討論。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139-170。

⁴¹ 參見清·全祖望編，《年華錄》（上海：商務出版社，1929年）。

⁴² 清·程元吉，〈程序〉，清·程得齡編，《人壽金鑑》（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頗具市場價值，棄之可惜，乃大幅增修刪訂，改為二十二卷。一方面自稱援原書，「於古人嘉言懿行，勝事美譚，凡屬有年可稽者，經、史、子、集，兼收並取，以每年為經，以各人為緯，而分繫之。」卷首「初生」，末卷「一百歲至百千歲」，其餘二至二十一卷以歲為序，一至九十九歲，井然成編。再方面於嘉慶廿五年（1820）重新成書後，改名《人壽金鑑》，刻版上市。

再經五十多年後，安徽出身的地方官林之望（1847年進士），於同治十三年（1874）閱及《人壽金鑑》一書，又謂深感其教化意義重大，決摘部分，另以蒙養形式刊布。晚年任湖北布政使時（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元年），復將原書二至十一卷，刪縮為上、下兩卷。上卷收一至十歲古人嘉德美事，下卷列十一至二十歲之賢良事蹟，每歲一章，每人一節，號稱為啟迪蒙養之主旨，專供授童之用，題稱《養蒙金鑑》，光緒初年刊布傳世。

⁴⁴

考之，有識者均知，妬羨神童，仰仗早慧，千百年來向為中國兒童及童年論述之主要底蘊。因此文化傳承之下，異賦天啟，是眾人真正豔羨卻求之不得的恩寵、神賜。百姓寄望可修德積善，祈陰德陽報，得一子孫聰慧過人。一般人常言以勤補拙，也可視為無從回天之下善盡人事的一種努力。由此視之，名之為《年華錄》或《人壽金鑑》方近其原來意涵面目。有新的開明人士欲以之為《養蒙金鑑》，由天生穎慧之記錄，轉而導向人為努力之榜樣，志固可嘉，不過包裝改換之間，未必能全掩其內涵之承襲，保證其實踐之成功。

藏，清嘉慶廿五年〔1820〕刊本），頁1。

⁴³ 清·顧廣圻，〈顧序〉，頁1。

⁴⁴ 參見清·林之旺輯，《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1282-1376。《養蒙金鑑》於光緒元年刊行於世，由湖北布政使司官署刻印，扉頁有「光緒紀元春月刊於鄂垣藩署」字樣，《中華蒙學集成》所輯即此版本，未見其他版本。

二、《養蒙金鑑》

迨見《養蒙金鑑》問世，其收錄史籍、雜著中數百古人幼小事蹟傳聞，嘉言善行，仁、義、禮、智、信等德目。幼兒部分仍如往者，特重生而穎悟，聰慧異人的故事。更欲從之突顯此等氣宇不凡之幼童，自小好學，勤奮有成等事蹟，端出此番特殊的激勵幼學，好成提攜後進之焦點。譬如「一歲」項下，記《舊唐書》載白居易「始生六、七月」，指識之無之典；與《金史》中記大定年間進士王庭筠「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故事。⁴⁵「二歲」項下，則舉《宋史》中日後擒李後主有功的樞密曹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它無所視，人皆異之」的掌故。以及明代《涌幢小品》中說張辰「二歲從父官上黨，所過山川、道里、厩置，若城郭、廨宇、園亭，久而不忘」舊事。⁴⁶

「三歲」之例，則有《北史》記北周人顏之儀（之推之弟）「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唐書》記權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許法慎「三歲已有知」、「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⁴⁷《文獻通考》曰，真宗召試神童，北宋奇子蔡伯侏方三歲，被授校書郎春官伴讀，且蒙賜御制七言律詩之贊。甚至《元史》說，耶律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⁴⁸元代仇遠《稗史》中以：「東方朔三歲，秘識一覽，暗誦於口」。⁴⁹連明代《天中記》中提到「黃泳年三歲，書一過輒成誦」。⁵⁰四、五歲後，神童苦讀成名的事蹟更是不勝枚舉。⁵¹

⁴⁵ 清·林之望輯，〈一歲〉，《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284。

⁴⁶ 清·林之望輯，〈二歲〉，《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285。

⁴⁷ 清·林之望輯，〈三歲〉，《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286。

⁴⁸ 清·林之望輯，〈三歲〉，《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286-1287。

⁴⁹ 清·林之望輯，〈三歲〉，《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287。

⁵⁰ 清·林之望輯，〈三歲〉，《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287。

⁵¹ 見清·林之望輯，卷上〈四歲〉至卷下〈二十歲〉，《養蒙金鑑》，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288-1376。

從《年華錄》到《人壽金鑑》，再由《人壽金鑑》到《養蒙金鑑》，一路演變轉化，頗可見盛清以後，太平繁華中人皆思進，蒙養要求固得及早起步，希望進境神速早已成了眾民安老怡親，自勵勵人的寄託所倚。至於同時間得開明識理之士所寫的種種幼蒙指引及幼學教材，在在告誡父師萬勿躁進，不必強逼，啟蒙太早，不免欲速不達。但無論如何勉求都難擋父母師長速達之心，遍存僥倖。中國經史子集積蓄神童早慧故事於廟堂、戲曲間偏傳遐邇。父兄親師可早讀早課，自授面命奮力直追，⁵²亦可如此所示，重新包裝舊說，以半新半舊，左右駁雜之勢充斥堂屋鄉里，然而幼慧之祈望，或轉成幼教之經營，常見於傳說、自述中。氣急而敗壞的長輩、呵斥至酷罰的塾師，全然無需渲染。因為一再編纂問世的神童事蹟、幼慧故事裡，連襁褓中三歲幼兒事蹟，都擠上名榜。從此鼓動大家，不但不可輸在起跑點上，更戒慎戰慄的是輸在中途與終跑線上的故舊、姻親與門生的身影（此書乃有百至千歲之神奇故事為例）。同一籍冊三度改編，具體而微地展現了清代幼教與童年文化，正隨時代的詭變而異化，同時也闡明幼教書籍所反映的，不僅是當時社會長幼單一前進中的「人心所向」，更是泛義多重、彼此拂違的兒童論述與童年文化在短期市場上之拉扯。

伍、游移中的責與罰：幼教之踐履與幼學之挑戰

近世蒙學幼教議論的另一焦點，是有關責罰、體罰，如何方得寬嚴適中的問題。對有效而適度的約束兒童行為，督促其學習求知之效率進度，向有持結果論或目的論者，如程朱一脈及民間文化中的嚴教派（「子不教，

⁵² Anne Behnke Kinney, "Dyed Silk: Han Notions of the Mor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7-56; Kenneth J. Dewoskin, "Famous Chinese Childhoods," in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ed. Anne Behnke Kinney, 57-78. 亦可見熊秉真，〈好的開始——中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近世家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201-238、及《童年憶往》，第三章「環境的堆砌與塑造」、及 *A Tender Voyage*, Section II Social Life, Chapter 4-6。

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主張為達預期結果，一切必施嚴格管制，不惜（其實是重視）運用體罰，以收實效。另一派人性樂觀論者，對教育與育兒傾採較自由、溫和、開放態度。理學中心性一派由陸而王，亦看重學習領悟之過程與經驗，相信習者各憑觀察領悟，父師等從旁輔助者僅須以鼓勵、關懷，誘其能，不必傷其天真愉悅。此種立場重在揄揚幼教與育兒。看似中心自發而歡喜的活動，故亦反對採拘禁責罰等「教」與「學」中的下下之策。清代幼教作者，塾學教師，對此問題一如先秦以來人性論者，各執一論，向來看法不一，致意反覆。清初崔學古的《幼訓》，王筠的《教童子法》等作，對責罰是否適切，再三考量，終難苟同。⁵³強調民間鄉鎮、家庭塾學，以打罵教育和「棒頭出孝子，嚴師出高徒」等口號，信口斥兒、隨手打人，乃至兒童常遭酷罰，絕非蒙學的可取之道。

一、鄉塾正誤

長期未了的辯論，適逢近代啟蒙後之教化論述襲自日本和西方，使清季咸同年間又出現了一個微弱而清晰的聲音。薊州（河北薊縣）士紳李江（同治元年〔1862〕進士，九年即因病自兵部乞歸）於清同治八年（1869）寫成《鄉塾正誤》一書，表達了他對當時民間教育發展狀況的瞭解與建議。

⁵⁴

⁵³ 參見熊秉真，〈近世中國兒童論述之浮現〉，《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先生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頁139-170；熊秉真，〈誰人之子：中國社會文化脈絡中的兒童定位問題〉，輯於漢學研究中心主編，《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9年），頁259-294，本文原發表於「如何的幼教，怎樣的童年」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北戴河，1995年），之後又經過修改，參見熊秉真，《童年憶往》，頁129-188。

⁵⁴ 李江，字觀瀾，薊州人，同治元年（1862）舉進士。同治九年（1870），因病乞歸。在穿芳峪建屋數間，名龍泉園，務農著書（有《龍泉園集》），一向關心教育，同治八年（1869）寫成《鄉塾正誤》一書。此書問世後曾有單行本流傳，其弟子於光緒廿至廿二年間（1894-1896）匯集其著作，編成《龍泉園集》，與同鄉王晉之（為清咸豐五年〔1855〕舉人，卒於1888年）的《問青園集》一同刊刻出版，此一版本可參見韓錫鐸編，前引書，頁1396-1405；其單行本則可見清·李江，《鄉塾正誤》（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

《鄉塾正誤》的第一部分，稱為〈幼學〉。逐條列出十數項作者指為當時塾學常見的陋習劣象，如「不敬蒙師」、⁵⁵「年年更換先生」、⁵⁶「不習禮儀」、⁵⁷「立冬散館」⁵⁸等。一一指摘，針砭時俗，就是書中標的所在的「正誤」。因拈出「偏於嚴偏於寬」的紀律之爭，說：

過嚴則弟子身心拘迫，血脈不能疏暢，因而作疾者有之矣；過寬則放縱驕惰，難完功課。必外寬而內嚴，或外嚴而內寬，而又必視我與弟子之性情如何。……⁵⁹

不親愛、不力行、不學文，反復警戒。嗣後遇學徒行事有合於孝弟等項者，則指其合於書某句，而對眾稱之。如有所犯，則指其不合於書中某句，而對眾責之。如此，則講一章書即受一章書之益，即知即行，始基於此。⁶⁰

此段議論，先稱過嚴過寬均易生弊，認為寬嚴須內外均衡相濟，並視師生雙方性情而定。子弟不論有惡行或善舉，或反復警戒或公開稱讚，不應涉及體罰。此處《鄉塾正誤》對揄揚或糾舉子弟善惡，行為良窳的看法，若

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1881〕津河廣仁堂刊本）。上述兩種版本在章節安排上略有不同，在《中華蒙學集成》僅收錄〈幼學〉一篇，但於頁1400注釋①則標明該書分成〈幼學〉、〈諸儒論舉業〉、〈諸儒論幼學〉、〈舉業〉、〈性習圖說〉、〈窮理層級圖〉等六個部分，而在清光緒七年〔1881〕津河廣仁堂刊本中，書分上下二卷，包括卷上〈幼學〉、〈舉業〉，中間附〈性習圖〉、〈性習圖說〉、〈讀書義利圖〉、〈窮理層級圖〉（橫圖）、〈窮理層級圖〉（豎圖）等圖、文，並重新編頁；以及卷下〈諸儒論幼學〉、〈諸儒論舉業〉等，特此說明。

⁵⁵ 清·李江，《鄉塾正誤》，頁1。

⁵⁶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卷上，頁2。

⁵⁷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卷上，頁2。

⁵⁸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卷上，頁6。

⁵⁹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卷上，頁7。

⁶⁰ 清·李江，〈諸儒論幼學〉，《鄉塾正誤》，卷下，頁7。在《中華蒙學集成》所收版本之中，將前注引文與本注引文合併在同一段落之中，與清光緒七年〔1881〕津河廣仁堂刊本不同，而且在《中華蒙學集成》所收版本中的「我親愛不力行」與津河廣仁堂刊本不同的「『不』親愛不力行」，有一字之差，特此說明。

與〈幼學〉篇中「子弟魯鈍便不加意培養」，⁶¹「子弟入塾，能上進者所望僅在進學、中舉、會進士，不能上進者所望僅在識字」、⁶²「讀書貪多」、⁶³「每日不就所讀之書考察其言動」、⁶⁴「字畫不講」⁶⁵等部分互證，益可見李江對兒童一體重視，賢愚不肖同樣顧及，尤重鼓勵提攜，助其滋長。注重人性及童子性善趨向甚明，反對教學上急功近利之風亦切。尤有進者，書中〈諸儒論舉業〉、〈諸儒論幼學〉等篇，雖列舉宋代程朱諸儒對考試舉才及幼學教育之相關言論，然卷上〈性習圖說〉則標出人性本善主軸，以為無論成善成惡，均在後天形塑。⁶⁶可見李江既重實際考察，又期革鄉塾風氣，遂以為程朱陸王之說，未必對立二執，實可並列參考。他號稱由實際經驗出發，造成重視兒童之立場，主採溫和方式，逐漸建立一套新的幼教幼學理念。明清以來，中國幼科醫學所衍伸的身體認識，身心相關等體會（「過嚴則身心拘迫，血脈不能疏暢，因而作疾」），與陽明所說：「誘之歌詩者，……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⁶⁷至此，類似主張之生理與哲思二重書寫，經時光沈澱，與日本歐西新說匯流成一有力表述。適為清季舊習欲折，新序求生之際。一種生熟交替、新鮮又不失親切的一種文化語彙與社會導體。作者為上段引文作結時，再申

⁶¹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頁1。

⁶²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頁1。

⁶³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頁3。

⁶⁴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頁4。

⁶⁵ 清·李江，〈幼學〉，《鄉塾正誤》，頁5。

⁶⁶ 清·李江，〈性習圖說〉，《鄉塾正誤》，卷上，頁1-2。又此「無論成善成惡，均在後天形塑」之幼教觀與乾隆時期大儒戴震之新義理思想契合，由此或可看出戴東原之樸學在有清一代之傳播與影響。有關戴震學說對幼蒙的影響可參見拙著《童年憶往》第五章及*A Tender Voyage* 中Preface和Introduction的內容。請參閱熊秉真，《童年憶往》，頁191-232；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xiii-xvi, 1-5, 19-28.

⁶⁷ 王陽明，〈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陽明傳習錄》，頁57。

「即知即行，始基於此」，⁶⁸以承陽明心跡，昭然若揭。

幼蒙教育中寬嚴賞罰之爭，不分東西，古今早有。初不因留守傳統或步向近代可全然廓清。然實證場域中，泛義混齡啟蒙，迨近世幼教市場大開，幼學年齡下移，使得過去未必專以稚齡人口為對象的蒙學問題，益顯棘手。不論是執行上的困擾（不少清代鄉間塾師說到教授幼童之不易，承認就算嚴罰酷刑也未必發揮得了當下清楚的效應），或是價值鬆動後的於心難忍，都催逼著父兄塾師不能不重新檢視慣性看法、作為之因循。此一內部因蒙學人口與設置之結構性轉型所蘊發的自我質疑，到十九世紀中，適逢間接傳自沿海及日本的粗略啟蒙洋風。不論是身心茁育、腦不可傷等近代早期身體生理論述的提醒，或者是愛幼護苗盧梭式開明派之微風，正以逐波蕩漾般氣勢，薰向中土。有清一代始終未艾的陽明學餘韻，至此無論語彙概念上遂得裡應外合效應。重新包裝下，此類外洋論說者引介出一個舊瓶新裝的社會支點。彼為我用、挪乾為坤、聲東以援西的事故，中外古今漫漫史頁中不窮層出，幼蒙之舉並非頭遭。不過如此再檢視所有對「近代化」、「現代性」議論，進步或革新即未必如倡議者所繪影繪聲、固執清明。蒙學方法之「過去」因幼教終程與新價值觀之丕變，自須另呈蹊徑。於此，長久以來，不庸言喻的嚴罰誨教也可能由亙古至理頓而幻化為可憂可疑的地方陋習。

二、蒙師箴言

重視受教兒童感受，強調誘導，主張寬衷並濟以提攜幼兒的論述，到晚清倡導新學之時，內外勢力合流，卒以新貌現形。此傳統與近代接軌，例證俯拾可見，未必須以斷裂性進步論或革命說，作歷史單線前進解說。

光緒年間，浙江吳興士人方瀏生（約1878年生），曾習法律，任小學教師，並關心教育改良。受二十世紀初新式教育啟發（如1902年出版的《初等國文教授法》），對教學原理、素材、方法上漸生一番主張。初以系列文

⁶⁸ 清·李江，〈諸儒論幼學〉，《鄉塾正誤》，卷下，頁7。

章連載於與友人合辦地方〈通俗報〉上。放言雜抒幼學理念，民初整理出版，成為《蒙師箴言》。⁶⁹

第二章〈教授略法〉第一節綱目就針對傳統塾學，疾言「勿背誦、勿扑責」。⁷⁰因扑責會「傷腦筋、害廉恥」：⁷¹

何以云傷腦筋也？蓋腦為靈性所在，無腦，則無知覺；無腦，則無智慧。……是知腦也者，宜保護而不可或傷者也。然腦之為物，柔嫩無比，最易受傷。外雖有頭殼包之，仍不宜磕碰。嘗有頭殼受傷，猝然昏暈，醒後若無其事。及越數日，忽失去一種性靈；或本來靈巧，受傷後變為木偶；或本來善記，受傷後竟無記性，皆腦筋受傷不能復原之故。此非特西醫千試百驗之說，我國名人亦嘗論及者也。⁷²

腦既為一切性靈所在，外傷就可能使人失去靈巧記性，彼謂此乃西醫千試百驗結果，顯示作者以當時西學薰陶欲倡新說：

童子之腦，柔嫩更甚，若一擊碰，即受損傷。而世之蒙師，全然不顧，往往以夏楚撻人頭殼。童子其危哉，童子其危哉！⁷³

⁶⁹ 方瀾生另著有《文字教授改良論》。此篇《蒙師箴言》，除緒言外，有兩大部分，前一部分〈教授略法〉論幼教原理，教材、教法，及具體實施方案。包括年級組織，課程安排，課時計劃，教授方法，以平日考核、考試、記分、獎懲等。且重視書法、珠算（清·王晉之，《問青園課程》中亦及，且提議並習古樂音律，「調習牛馬」，「宜於農務」，以近「武備之道」）、造句、寫信等實務訓練。他排除眾議，主張學生閱讀演義小說，且應增設遊戲、體操、圖書、手工、唱歌等活動。《蒙師箴言》的後半部分且在強調教育救國的理想，雖仍一再提倡「訓蒙志，樂事也，非苦事也」，且特別要蒙師用「合群」的方法，互相濟助以解決經費，時間，精力之不足。《蒙師箴言》連載於〈通俗報〉外，另有民初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參見方瀾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17-1719。

⁷⁰ 方瀾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1。

⁷¹ 方瀾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5。

⁷² 方瀾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⁷³ 方瀾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以腦部受傷為告戒塾師扑打之基礎，當時確屬新論。舊時清代傳記曾載如章學誠幼時所遇塾師，每日扑人，生生遭打，且重擊傷頭，皮破血流，倒地昏迷，癒後頭部隆起。⁷⁴可見作者方氏「童子其危」之言未必誑語。然就實踐面考慮，他亦知要勸得塾師改弦更張，並不容易。轉而婉言相勸：「諸君向日，特出於不知耳」，以不知不罪，「從茲以往，但願諸君之勿憚改而已。」⁷⁵

扑責之害，除了生理上會「傷腦筋」，心理精神上還會導致「害廉恥」：

何以云害廉恥也？……人之所以奮發，賴乎有恥；人之所以成就，賴乎有恥。扑責者，最足傷童子之廉恥者也。……誠能訓導有方，豈在扑責？……蓋人之知識、人之德性，循序而進。……而世之蒙師，怠於訓誘、濫用夏楚，一若師之責任可以一打盡之者！⁷⁶

痛批為師之責盡在體罰，又稱「星期餘閑，游覽各鄉塾。見有三人一群、四人一黨，捉盲者、擺播者、相罵者、打架者，擾擾紛紛，頗不寂寞。」⁷⁷學堂秩序顯然也有問題。還說「又歷一塾，初近門，即聞拍案聲、呼叱聲、扑責聲、飲泣聲；入其室，則背書也。先生危坐，凶若惡神；學生植立，呆若木雞。學生愈背不出，先生愈打；先生愈打，學生愈背不出。」⁷⁸於是在「書背不出，則打；自己失察，學生偶有小過，則打。」⁷⁹的情形下，使學生在校「如登法堂、如遊地獄」，⁸⁰教與學都陷入末路窮途，因為：

當其打時，或謊言欺飾，或忍痛受苦。一旦放學或先生他出，則如野馬之無繮、狡猴之斷鏈，無惡不作以為快。而先生乃憤然曰：

⁷⁴ 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5。

⁷⁵ 方澗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⁷⁶ 方澗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⁷⁷ 方澗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19-1720。

⁷⁸ 方澗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0。

⁷⁹ 方澗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⁸⁰ 方澗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0。

頑劣！頑劣！嗚呼！豈學生之生而頑劣哉？有迫之使然者也。⁸¹

除了痛斥打罵教育之錯誤與無效外，作者仍希循著甫聞之兒童心理學新徑，看是否能建立起某種迥別於前的新式教學倫理，乃至新的教與學的方法。故其欲張體罰的負面效應與破壞性後果，也在為此新式幼教蒙學之道德理論、社會心理與制度理性上尋一新支點：

屢屢用之，則學生反以被打為常，不以受罰為恥。凡迎合先生、誘過同學以及規避、設詐……種種無恥之事，無怪其無所不為矣！

⁸²

此處重點在指出，教師常施體罰很可能會使被罰的學童習以為常，而一旦學生以被打為常規，毫無恥感，即可能導出百般巧詐，終致無所不為。為教與學的良性互動設想者遂不能不感歎：「嗚呼！童子而無恥，欲其奮發也，難矣！童子時而無恥，望其將來之成就也，更難之難矣！」⁸³換言之，仗體罰為蒙學教育之措置，將使之與所欲灌輸之教材內容、教學目的、以及幼教的建設性效應，相牴相消。

《蒙師箴言》提出「稱讚法」、「詰問法」、「功過法」、「離群法」、「直立法」、「拘留法」，取代扑責，用以面對「學生有貪玩不肯讀書，頑梗不聽教訓者」之情。⁸⁴其設想諸法，莫不以兒童之性情喜惡、習慣傾向為旨歸（「小兒喜戴高帽子」、「人無不喜群而惡獨，童子尤甚」等等）。⁸⁵明言許多靈感，源於已有之文化習俗（稱讚法「又名褒貶法」）⁸⁶或地方上已有的規距（直立法「吾潯曰立壁角」，⁸⁷拘留法「吾潯曰關夜學」），⁸⁸如今不

⁸¹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⁸²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⁸³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

⁸⁴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1728。

⁸⁵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6、1727。

⁸⁶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7。

⁸⁷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7。

過考慮斟酌，修改整理，融為新義。

強調幼教勿用扑責的說法，與作者倡言「勿背誦」（「窒性靈」，「廢時刻」），⁸⁹代之以抄課、勤講、問答等法，⁹⁰以及奉勸「勿讀經書」（四書五經「冗長」、「牽強」、「艱深」），⁹¹增加遊戲、體操課程等，宗旨一致。始終寄望教與學均為樂事，企求教育活動之本質奠基於幼童師長無可剝奪之中心愉悅。初閱者見此議論，固可逕稱引自外洋，但熟知陽明人性論與近世蒙學演繹、及明清幼教傳承者，再考其遺詞淵源用意曲折，尋繹其微言大旨，不能不考慮到十九世紀內外，雙股歷史流變於是世紀之變匯現中土的另一番來龍與去脈。

陸、再看清代童年文化與幼兒世界之喧嘩與移轉

一、境遷、時移與波折紛湧

上舉數端，流覽概略，可示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化傳統，以有清一代為例，至少在幼教發展和兒童文化上，未必呈現一個僵化不動，停滯不移之局。清初兩種風貌不同之文獻《父師善誘法》與《傳家寶》，新舊交織均倡教學在善誘之議。盛清時期，由《年華錄》至《人壽金鑑》至《養蒙金鑑》，顯示對早慧早熟的習慣信仰始終未艾。由異稟神童 而得榜樣，不論看之為年華、人壽，或舉之為養蒙之鑑，舊酒如故，新瓶亦不新，幼學所仗的，是不可期的天寵。至晚清，《鄉塾正誤》與《蒙師箴言》兩書，可見鄉曲間對責罰的斟酌及爭議。來自三個時期的三組幼蒙文獻，展現了清代幼教論述和童年文化的多重變奏。其他有關蒙養幼學的觀念商榷、教學方法的商議，以及一般兒童生活與教化規矩的材料，所遺尚多，猶待細析。本文所舉三個段落所示三套議題，不過勾劃出清代幼蒙天地與幼齡文

⁸⁸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7。

⁸⁹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1-1723。

⁹⁰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3-1725。

⁹¹ 方瀏生，《蒙師箴言》，輯於韓錫鐸編，《中華蒙學集成》，頁1728-1731。

化，變與不變之部分輪廓，如對文化史所作大筆寫意，或對社會神態理得之側面景象，自難盡曲折之細緻。

三議題牽出的疑問非拘文獻所屬時代。善誘導、莫匆促、戒體罰的呼聲，之所以上承明代之前，延伸近代以後，有其更深之故由。也就是說近代中國師長中，之所以有認為過去幼兒教養觀必須汰換，與近世數百年來各城鄉中層人士質疑傳統的適用性，很有關係。倡善誘者，由明而清初，經盛清而晚清，少人不曉，各人的領會主張，氣質重點雖紛陳自異，但對早慧早學，急趕進度的心態，盛清以前，早有非議。清初而清末，勸戒家長教師欲速則不達，蒙幼「莫匆匆」者，與一心崇仰神童，趕鴨上架之間的拉扯紛爭，至今未歇。管理責罰如何適當，更是宋元明清，或者說此前彼後，歷萬古而常新的疑惑。三組大議題拱托下，清季再見陽明心性說對開放式幼教的啟迪與鼓舞，近世中國幼學與童年文化之演變過程與形成大貌自難全歸於西力之衝擊，或引進西說後單線之歷史進步。

因幼學與童年之議題，實證現象、理論預設、與歷史發展三者環環相扣，於認知學習與兒童發展上相互生產，十分明顯。迨清季而近代，啟蒙西化挾歐美勢洶頓成近代化動力，啟迪民智、立國立民者，隨勢援引，亦稱確據鑿鑿。然一旦倒轉時光，則質疑驅童入學，為教與學發展上的死胡同，⁹²甚至對全球近代歷史之走向，興出不善不可等等悖逆思緒，此另股歷史洪流，同樣可興起沛然不可禦之勢。弔詭的是，對於兒童或者蒙學，何者為文明之開發，而非專斷之斲喪，何者為殘酷之催折，而非必要之培育，古往今來，或東或西，專家或俗子，始終未得一個足資永式的憑仗。近代之演變並非一去不返之進化，不論在清季的中國，或稍前乃至同時的西方各地，也就不能不落入史無定軌之低迴。眼前無盡而不安的抉擇中，

⁹² 參見Philippe Arié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書中引言及第二部分Scholastic Life中第三章The Origins of the School Class、第四章 The Pupil's Age、第五章The Progress of Discipline及結論Conclusion: School and the Duration of Childhood等章節中對童年與近代教育之質疑。

或進取，或保守，甚至執意「迷信」，過去、面前、與邏輯或歷史延伸出的未來，新舊並存而不斷反置。前跡斑駁，後道不一，歷史上的清代幼教與童年，不是新舊二義，前進或守後足以定奪。正因如此，當時因幼蒙與幼童所興之論，良知良能說所加入的拉鋸，在知識或生活領域，都投下一把引人注目的碎石，在近世文化社會史與兒童心理發展論上激起陣陣漣漪。

二、重想「現代性」議題之提出

上文重檢清代幼教論說與當時童年文化，所透露的既不如以近代化動力自居的後來興革者（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所自詡，有攸美而堅定不移的千古傳統，也不像外來抨擊者（如宣教士，西方列強或西方衝擊說者）的主觀定見，直指原有之傳承核心，僵化而少變，過時且與既有權利體系相結，難有反省自變之蟄動。反而是以層層素材間之矛盾交雜，折而質詰種種現代學院知識之眼光凝視，反生各樣對近代學術論述意覺後的一連串疑問、矛盾、不安。若依社會改革與現代性論述學者之說，傳統社會及其價值，反覆承衍代代依從，則成長受教其中的塾師父兄，子弟蒙童，遂無自我省視，贊同掙脫樊籬之可能？如此預設之下的幼學或童年歷史容或僅有單一而固定的承襲而無行進之途？

也就是說時光之淬煉，不論在史學所究之史實、史事層次，以及激發引導此歷史研究，與協助建構歷史解釋（過去稱為史識）與文化論述，另有其自省與變化之來源，此學理反思對歷史研究如幼學、童年解釋之影響，不能不理。如近世蒙學與兒童生活之演變，到了清代，村野鄉塾一般的日常經驗，從教子弟為務的父兄，到終生課塾的中下層教師，他們所遇所見，經常面對的情境，導其心思所向、疑問所在，正醞發著波波異於高頭講章企劃出的歷史動力。這一層社會文化背後的動力，催促他們即便本願照舊崇奉程朱式的小學、大學之道。卻身不由己地不能不心儀嚮往陽明知行學說的抒解與鬆動。在此層次下，微觀經驗層次的需求，帶動也醞釀了操作者的自然興革，與自動選擇其之所以棄程朱而重陽明，有實證和執

行面的理由，未必皆因形上或哲理上的考量。也就是說，近世南北鄉里村塾個別學童與塾師實際經驗的導引，適逢明代心性之學對人性、天理鼓舞的「舒活」、「開放」式訓蒙與啟智契機，到清代幼教蓬勃普及、幼學人口大量增長後，彼此匯合而築構、摸索出一束束自以為幼教幼學上的曙光，類似經驗與理念的不斷交融互動，才是使中國近世幼學的議論和童年經驗之型塑，視似上承宋明，下啟近代，實則在持續重構每一階段各自與環境相銜的幼蒙教育與文化心理生態。

再思這個望似不覺中迎向清季近代啟迪人性、教化眾生的文化生態，其所捐棄之成見，其所擲諸腦後的傳統，在當代學術論述高張近代啟蒙理性，與革新革命的價值觀引領之下，左右後代學術詮釋之焦點的，並不是清代庭訓塾學中教、學不已的大小成員，而是其周圍高唱新穎幼教與人生理論之人，尤其是其中若干聲息之所向適得呼應下一波歷史論述下新民建國實踐之道者。

最後一層的問題是，近代之歷史或歷史發展之現代屬性，於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初之交，又復醞生出不止異於往昔（形塑前二階段學術思維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之立場。此等日新又新的知識論述，對於人生各階段之發展、教育制度之界定方針與童年經驗與幼學啟迪的立基所在，意見紛披，與上數階段之認識主張歧異均深。過去以為由西而東，由地方而全球的幼教啟蒙發展，今知並非單因西力東漸後結果。至此，歷史之延長發展與延伸性反省，遂使歷史軌跡與歷史意義雙層時空均生倒置作用。後世對歷史之挖掘愈認真，對史料史事之掌握愈細緻，對歷史視角考量愈多，對歷史之發展軌跡，詮釋之學愈不能不持開放之想像。近代的歷史，至少在幼教和童年的交織點上，在史事與史識兩層次的發展上即呈現此一反覆爭議、前後相互顛覆而交叉演變的過程。

柒、結語：兼及童年與幼教史之素材、方法與學理 論述之遷移

跨越世紀之交，重拾舊問題，對清代幼教的轉折與童年論述文化的新瞰，不僅對所謂的「傳統」與「前近代性」(pre-modernity)之風貌與相互關連得一非線性(non-linear)認識，對所涉數百年家庭、社群因環境、制度而顯現之自變與因變，亦由微觀研究之抽絲剝繭，而另得多重瞭解。由之史學之外，其他究心幼教與童年研究者，亦獲若干有別於先前預設之概念與驗證。清代中國的童年文化與幼教發展，一如許多其他近代之前的社會，原有繁複多面與矛盾兼存之特徵，此童年與幼教世界，既為駁雜的制度、互斥的概念所環繞，史學掌握之結果自須於方法論和概念上，重建一多面寬闊而難以制約化的人文生態，及其靜動互見之演變機制。

十九、二十世紀所謂近代化之初啟，一度於全球論述與學科專業上使兒童、童年、幼教變成專精特殊，又科學制式之領域與議題。晚近重思此事始覺其利弊互見，遂期重啟反省調整。因之，此際，回頭檢視清代幼教演變之跡，對當今幼教與兒童研究仍以西方(歐美)為主流之知識論述與文化環境，可收一番切磋與提醒之功。蓋過去一世紀間，歐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和實證精神主導下的幼教與兒童文化主流，可取之處固然不少，然其偏執與偏狹實為同一事之另面，亦十分鮮明。時下欲矯其武斷與自我中心之失，正仰對前此十九世紀之前發展的另立視野，重構意義。

幼蒙與童年理論，由近代之前經過近代之振奮、翻騰，走向近代之後重新的徘徊與斟酌。不但為知識、生活與現代性三者間不斷游移、糾葛，時竟周而復始的過程，端出一組鮮活的事例。對史學方法，學科理論與歷史事實之間的相互憑仗，彼此對質，也提供了一個尖銳而凸出的示範。近代史學，既為近代知識生產與文化論述的之一環。此專業成品與知性工具，於舉世邁向近代之初(歐西的啟蒙以後，中國的晚清民國)，因社會

人心多方面需要，價值概念重釐時，嘗提出一波波關注教育（尤其是普及幼齡的國民義務教育），護愛兒童為近代式倫常，與進步式設計。在這套設計與主張的提倡之下，近代的史學也未嘗不懷其仁心智術，挖掘東西各社群在此前世紀所處蒙昧、智愚賢不肖之參差，理成一番階段有致、大勢配合的「傳統」圖像，以投入一同打造新天地之近代知識工程。問題是，經過百多年來全球社經、政治、文化發展的歷史大躍進後，兒童發展心理學新益求新，幼教理論均不約而同地對全球競逐者頓興驀然回首、昨是今非式之理解與醒悟。不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有俯首承認過失的態勢。指出近代制式教育，課堂蒙學對幼兒之拘泥、對教師之束縛、對人性之伐害、社會資源之浪費、對群體未來之局限，負面影響似乎日益明顯。流風所及，社會文化史工作者，亦有從史料細節中發現，意及當下社會理念之變，正可重覓歷史素材，更新研究方法，重思詮釋座標，一則用以應付這一新階段史學與史識之再調整，二者亦與變動中的外在環境，重新尋找近代之後文化與學術之立足點。

值今再檢視與近代接軌之際，及與以前的近世蒙學與童年天地，遂有另一番史實呈現、史跡羅列與學理詮釋之可能。以見早在歐西啟蒙理念與制式教育輸入，近代化之人生規劃與民族國家論述蔚然成風之前，清代之中國，一如西半球少數歐西社會之外的社群，曾在另一套（或數套）歷史意義之軌道上滾動。這個近世中國幼教實作與童年論述的軌道上，因有程朱陸王之爭，衍生幼學匆匆、勿擾勿助，謹責慎罰等提醒。同時又因知性制度變化（科舉普及），人力市場之成長（工商士農均需其子弟識字，又有大量科場失意待業者投入塾業），生徒日益增加，塾師源源不絕與大量增長心焦意切的家長合流。這些現象發展與歐西有相類亦有相遠，上世紀之交，短時間內一度為全球近代化與現代性之大勢所吞噬淹沒，合流為一。值今世紀又變，西方自省復甦，中文學界或近世史學者卻愕見其原本涵藏的若干另類傳承，如陽明學對人性、自然、與人生發展的另番執著，及道家佛釋對蒙學幼教與兒童、童年所暗示的玄機。若擷取其中若干概念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三十六期

預設為新基，未嘗不可延伸發揮，以掙脫近世西半球歷史思維之常態（或魔障）。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清·唐彪輯注，趙伯英、萬恆德選注，《家塾教學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清·石成金，《傳家寶》，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1739）序重刊本。
- 清·石成金著，全青輝、閻明遜點校，《傳家寶》，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1992年
- 清·全祖望編，《年華錄》，上海：商務出版社，1929年。
- 清·程得齡編，《人壽金鑑》，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嘉慶廿五年（1820）刊本。
- 清·李江，《鄉塾正誤》，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1881）津河廣仁堂刊本。

(二) 近人編輯、論著

- 王陽明，《陽明傳習錄》，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 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臺北：商務出版社，1980年。
- 翁麗芳，《幼兒教育史》，臺北：心理出版社，1998年。
- 陸游，《劍南詩稿》，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
-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年。
- ，〈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201-238。
- 韓錫鐸主編，《中華蒙學集成》，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
- Arié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 Cohen, David K. and S. G. Grant. "American's Children and Their Elementary Schools." *Daedalus* 1 (1993): 177-208.
-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Contexts of Optimal Growth in Childhood." *Daedalus* 1 (1993): 31-56
- Dewoskin, Kenneth J. "Famous Chinese Childhoods." In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edited by Anne Behnke Kinney, 57-7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Heywood, Colin. *Child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 Health, and Education among the 'Classes Popula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siung, Ping-chen.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inney, Anne Behnke. "Dyed Silk: Han Notions of the Mor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edited by Anne Behnke Kinney, 17-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Ko, Dorothy. *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Minow, Martha and Richard Weissbourd. "Social Movement for Children." *Daedalus* 1 (1993): 1-29
- Pollock, Linda A. *Forgotten Children, Parent-child Relations from 1500 to 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hahar, Shulamith. *Childhood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 Vinovskis, Maris A.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n and Now." *Daedalus* 1 (1993): 151-176